

何谓“冷战思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张小明

[提要] “冷战思维”一词含义很不明确,使用者们对它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把“冷战思维”定义为“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是不恰当的。“冷战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非友即敌”和必须确定一个头号敌手的观念;把前苏联当作评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行为的参照物。冷战思维是导致“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冷战思维”一词频繁出现于我国报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可是,只要稍微留心,读者便可发觉“冷战思维”一词含义很不明确,使用者们对它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冷战思维”到底指的是什么?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分析,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仁。

从我国报刊看,“冷战思维”被普遍定义为“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199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该报年终专访时谈到1995年国际形势的几个特点,其中第三个特点是“……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冷战思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有所发展,使国家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增加了动荡和不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冷战思维”即指“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陶炳蔚也使用了类似的提法。在一篇文章中,他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视为在东北亚冷战思维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指出:“有的国家自以为具有某种优势,便企图主宰或主导本地区,并且动辄对别国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甚至干涉别国内政。本地区各国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在本地区事务中具有平等地位,不需要别国来主宰或主导。而且形势已变,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待别国,不但有悖于当今的历史潮流,而且到头来只能自食其果。”

也有的人士不用“冷战思维”一词,而用“冷战因素”或者“冷战影响”的提法,实际上,“冷战因素”和“冷战影响”都是“冷战思维”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它们的意思大同小异,主要指的是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

近年来,随着国外某些人士鼓吹“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中国官员、舆论界以及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对这样的论调给予“口诛笔伐”,并把它们视为“冷战思

维”的产物或结果。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是“冷战思维”的重要表现形式,但是综观目前已发表的批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的讲话或文章,大多数作者并没有解释清楚“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所体现出来的“冷战思维”指的是什么。我想,单单指责“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而不深入分析是什么样的冷战思维在这些论调的鼓吹者头脑中作祟,这样的批判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也无助于揭示“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的实质。研究者们更不应该如此。

所谓“冷战思维”,顾名思义,就是在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人们观察国际事务的特有的思想模式或认识框架,以恃强凌弱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确在冷战时期肆意横行,但是,不能说它是冷战的特产。弱肉强食一直是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的一个不成文法则,因此,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同于冷战思维的提法,似乎有点牵强。

那么“冷战思维”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依笔者一孔之见,冷战思维至少有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东西方互视对方为敌人,并且努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其结果是,冷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两种制度和信仰之间的较量。冷战之后,两种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有些西方大国仍旧把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当作判断别国政治行为的标准,并且施加各种压力,企图改变他国的行为,促使他国按自己的意志发

199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6版。
陶炳蔚:《东北亚局势的发展变化》,载《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2期。

生和平变革。冷战时期美国的基本对外指导思想,即“遏制”概念,至今仍然被很多人提出来,用以对付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

第二,“非友即敌”和必须确定一个头号敌手的观念。冷战时期,由于敌友界限分明,冷战的一方视对方为自己的最大“威胁”,以此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依据。随着冷战的结束,也就很难判断谁是一国安全之最大的“威胁”,因为同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敌友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一国安全的威胁来自何方已经成了很不确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之后的政治家们面对的是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现实。显然,应当从新的视角观察和分析冷战后的国际现实,并且依此制定对外战略。但是,世界上还有不少的政治家习惯于从有一个最大、固定不变的“威胁”这个角度来思考冷战后的国家安全问题,把一个国家视为潜在或假想敌人。冷战结束之后,国外一些人士鼓噪“中国威胁论”,大概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因而也是冷战思维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

第三,同前面两个观念密切相联系的是,西方某些政治家和战略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仍然习惯于把苏联当作评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行为的参照物,“苏联因素”似乎还在影响着一些西方大国的对外政策。其突出表现在:西方有的战略家主张,西方大国应当重点援助俄国,支持其政治和经济变革,使得民主的俄罗斯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榜样。在他们看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很快,如果只是中国成功,而俄罗斯

遭受失败,“结果证明一个共产党政府可以比一个民主政府为私人提供更好的投资机会,那将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相反,如果俄罗斯获得成功,表明“俄罗斯民主资本主义”可以同“中国资本主义”相匹敌,那么“政治和经济自由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成为一股汹涌的浪潮。”也就是说:冷战时期,西方制定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这些国家同苏联关系疏近的认识和判断,“苏联因素”是西方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以后,西方政治家又希望世界上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能步前苏联的后辙。因此,冷战结束了,看来“苏联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它也是冷战思维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密切相连,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前提。把中国视为“威胁”和需要加以“遏制”的对象,既反映了国外某些人士习惯于冷战时期那种敌友分明、确定一个国家为敌人的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些人仍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冷战后世界的思想观念。因此,虽然不能说“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只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但是冷战思维无疑是导致这样论调的重要因素。

“冷战思维”的确切含义很难界定,作者无意也无力给这个概念下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定义。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引导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一问题,努力把概念搞清楚,理应是学术研究的前提。

[责任编辑 邵峰]

· 国内外文摘 ·

虚体国家的兴起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外交》杂志 1996年7-8月期)

发达国家在不是为在文化上占支配地位,而是为在世界产业中占有更大份额而斗争时,纷纷把军事、政治和领土野心搁置一旁。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唯一名副其实的国际文明是起主导作用的世界市场的经济观念。然而,全世界的注意力仍错误地放在为领土而展开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上。

在资本、劳动力和信息流动的经济大国,已不存在迷恋土地的现象,它们宁愿开发世界市场而不是占有领土。虚体国家——不重视以领土大小来确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是这种不受领土束缚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人们常谈论虚体公司的崛起,生产设施和公司总部不在同一地方的现象越来越多。但是更重要的事态发展是在政治上,即虚体国家的兴起。虚体国家是虚体公司在政治上的对应实体。

虚体国家是其经济依赖于流动性的生产要素的国家。当然,它拥有虚体公司并通过其企业控制在外国的直接投资。其基本的经济原理是通过缩小生产规模提高效率。在21世纪,虚体国家掌握着通过竞争创造更多财富的钥匙。它们可能取代以往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实体。在欧洲,瑞士是典型的虚体国家,以雀巢公司为例,它98%的生产能力在国外。

制造业的重要性将继续降低。效益好的高价值的服务行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将同制造汽车和电气设备的行业一样大。由于这些趋势,世界可能越来越明显地分为“头脑国”和“身躯国”,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综合这两种功能的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强调头脑功能,而中国则是21世纪身躯国的样板。中国将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生产制成品的地方。

虚体公司需要其他公司的生产设施,虚体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的生产能力。结果,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会变得像联接分处不同地方的大脑和身躯的神经。从这种方式维系在一起的国家是不大可能发生冲突的。

(美)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范建民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第33-69页。
王缉思:《‘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